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

木越义则

引言

本文旨在利用2011年公开的重庆国民政府的贸易统计,对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从定量角度加以确认。笔者此前曾利用汪精卫政权的贸易统计数据,对日军占领地区的对外贸易进行了分析。^①在此,将综合汪精卫政权和重庆国民政府两方面的贸易统计,揭示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全貌。

近年来,有关战时日本对中国经济占领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探明中国所蒙受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还关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经济是如何发生变化、其变化又对战后产生何种影响等方面,旨在客观把握战时变化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被视为开拓性的研究中,长冈、西川指出,即便在战争期间,上海90%的工业设备也得以维持^②;而林采成则发现在华北地区,日军积极修建铁路,铁路运输量扩大。^③

关于国民政府统治的西南诸省的经济情况,久保亨指出,通过同盟国援助和贸易统制,国民政府获取了丰厚的外汇,这为其制定并实施战后重建政策奠定了基础,说明战时对战后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④

与上述有关战时经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在对外贸易方面,自郑友揆对汪精卫政权和重庆政府的贸易统计进行了先驱研究以来^⑤,颇有后续无力之感。诚然,随着在200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中国海关统计的整理出版,多种统计手法被引进贸易史研究领域,但由于该覆刻版不包括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统计,因此关于战时的分析大多止于1941年。

统计资料的匮乏,也使从日本经济史角度展开的战时贸易史研究举步维艰。例如,山本有造指出“大东亚共荣圈”中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北方圈,与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南方圈相比,其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均相对得以维持,但同时他也提到在做定量分析时受到了资料匮乏的限制。^⑥

不仅中国,亚洲各国各地区有关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都非常匮乏。就中国而言,随着重庆国民政府贸易统计数据的公开,迄今为止受限于资料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而且,中国的贸

① 木越義則「近代中国と広域市場圏——海關統計によるマクロ的アプローチ——」、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年。

② 長岡新吉、西川博史編著『日本經濟と東アジア』、ミネルヴァ書房、1995年。

③ 林采成「日中戦争下の華北交通の設立と戦時輸送の展開」、『歴史と経済』第193号、2006年。

④ 久保亨編著『1949年前後の中国』、汲古書院、2006年。

⑤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⑥ 山本有造「『大東亞共榮圈』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年。

易统计,是涵盖直到1945年8月战争末期的为数不多的统计资料之一。下文将从贸易统计的角度,对中国战时经济的情况加以探讨。

一、战时中国的贸易行政

(一)日军占领地区的贸易行政

在探讨贸易统计的数值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战时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行政,以及相关制度。通过此项工作,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统计数值所具有的含义。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并未完全控制占领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是因为,在被日本占领的口岸城市中,存在着欧美各国的租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贸易行政,一直是以欧美人税务官员占据要职的中国海关为主体来实施执行的。

自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大约4年半的时间内,日本竭尽所能试图封锁国民政府与国外的贸易与通讯。在长江流域,以处于战斗状态为由,禁止了一般船舶的通行。在华北,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对租界和内地的通讯加以限制。还干涉上海共同租界和法租界的行政,试图确保军事行动的自由。然而,由于欧美籍的船舶一如既往地可以自由出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口岸,因此国民政府偏安的西南各省的特产得以继续向欧美出口,外国产品也在广泛范围内得以流通。可以说,中日战争的爆发并未立刻使中国与国际绝缘。

随着1941年12月8日的日本对英美开战,这一情形发生了巨变。日本陆军在开战的同时,接收了欧美租界,清除中国海关中的英美职员,完全控制了占领地区的贸易行政。日本海军对华南沿岸的口岸城市进行了海上封锁,阻断了中国与盟国之间的贸易和通讯。而在长江通航方面,除日军的物资运输之外,与国民政府所占据的上游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被完全禁止。

日军占领的口岸城市,自1937年7月的河北省秦皇岛,至1941年4月的宁波,共计22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香港(九龙)。太平洋战争中,在实行海上封锁的同时,日军所支配的港口大多关闭了海关,贸易被限定于12个口岸城市。华北原有的5个口岸(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青岛)的贸易得以维持;长江流域的海关除汉口外全部被关闭;长江以南的沿岸地区被限定于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江门、琼州6个港口。从被关闭的海关的地理位置分布可以看出,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在于同时实现两个目的,即在确保华北资源向日本本土运输畅通的同时,封锁国民政府的对外联系。

众多海关被关闭的事实显示,这一时期的贸易统计局限于日军所控制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基于船舶运输的对外贸易情况。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在其背后,还存在着日军无法得知的由无数经济主体组成的“走私贸易”。

(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贸易行政

从南京到武汉,然后到重庆,辗转内地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被日军夺走了主要的贸易港口。但即便如此,如前所述,由于海关自身仍在以英国为主的外籍官员管理下继续运营,因此与欧美诸国之间的贸易得以继续。其主要窗口是香港、广州湾租借地和西北地区。

然而,至1940年,日军占领地区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间的贸易,由于受到日军的进一步限制,中国本土市场陷入了两个地区割裂的状况。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与外国之间的贸易,也变得愈发困难。1940年9月,为封锁英美对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军事援助,日军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继而于1941年6月,在德国开始进攻苏联后,经由西北地区的军事物资进口,也因运输困难,几乎陷于停止状态。

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的1938年以后,所能掌控的口岸城市,大体上仅限于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17个城市。1941年12月8日,日军接收中国海关,控制了沿海地区的贸易行政后,

国民政府于同月26日宣布从汪精卫政权下的中国海关独立,将贸易行政的执行机构改设于重庆。之后,从1942年1月开始,沿与日军占领地区交界的前线,新增设了7处海关。7处海关之下,在主要流通地设置海关分支机构,总数达460处。为弥补丧失的沿海地区的关税收入,国民政府还引进了临时战时消费税,对商品流通一律课以5%、奢侈品20%的流通税。

从1942年至1945年8月,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对外贸易动向,同样直接反映了与日军之间的战局变化。1942年以后,日军攻陷缅甸仰光,滇缅运输线被切断,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因此在该地区,不得不改用空运经由印度进行援助物资的运输。在长江流域,从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日军屡屡发动攻势,上游的沙市、宜昌等重要港口被占领,对外贸易几近完全中断。此外,在华南的西江地区,水路封锁日益严峻。从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击盟军的空军基地,确保连接华北—华南的铁路交通枢纽,发动了名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大规模攻势。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失去了湖南和广西境内的多个城市。无需赘言,随着流通过程和流通基地的沦丧,国民政府的贸易必然日渐缩小。

在利用重庆国民政府的贸易统计数据时,我们还需要对贸易主体加以注意。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因实施统制贸易机制,西南诸省的特产中,与军需产业关系密切的初级产品,需经政府相关机构之手出口。其中一部分是与同盟国进口物资之间开展的易货贸易。此外,不仅是政府,民间机构也时常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这意味着,这种易货方式并未被计入本文所利用的贸易统计之中。另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的贸易统计中,还计入了经由日军占领地区的贸易。这对于了解日军的贸易封锁状况,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来源,但是在对国民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对外贸易进行判定时,缺乏严谨性,需要加以注意。

二、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推算

(一)资料与名义贸易额

从表1中,可以对从原贸易统计资料中得出的战时中国贸易额的演变加以确认。各项目的资料来源如下:

1. “满洲国”:1936—1942年的资料引自“满洲国”经济部编《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年报》各年度版。^① 1943年的资料引自“满洲国”经济部编《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报》1943年12月号。^② 表1中的“进出口”,指总进出口额中扣除对中华民国的进出口额的部分。“移出入”指对中华民国的部分。货币单位为“满洲国”元。

2. 日军占领地区:1936—1942年的资料引自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各年版。^③ 1943—1945年的资料引自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中国贸易统计月报》的1943年12月号、1944年12月号和1945年8月号。^④ 1941年为止货币单位为法币,1942—1945年8月为联银券。从1943年起,原资料中以联银券和储备券两种货币表示,本文按照当时的“政府汇率”,即1943年1联银券=3储备券、1944年以后18联银券=100储备券的比率进行了换算。

^① “满洲国”经济部编:《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年报》(1936年—1942年),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附属社会科学统计情报研究センター藏。

^② “满洲国”经济部编:《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报》(1943年12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

^③ 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6年—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45册。

^④ 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中国贸易统计月报》(1943年12月、1944年12月、1945年1月—8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藏,《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缩微文献,1990年。

表1 战时中国的贸易(名义贸易额:100万元)

外国贸易	出口			进口		
	“满洲国”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满洲国”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1936	474	654	53	644	908	37
1937	531	759	80	848	913	43
1938	603	670	94	1204	853	40
1939	666	858	172	1749	1224	119
1940	503	1792	184	1673	1888	156
1941	516	2563	348	1309	1946	474
1942	593	1500	192	1229	651	1445
1943	708	1210	164	1132	1047	3384
1944	711	1371	997	729	1456	4418
1945 1—8	n. a.	2799	749	n. a.	3418	5876
国内贸易	移出			移入		
	“满洲国”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满洲国”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1936	129	989	143	48	673	498
1937	114	957	145	39	662	489
1938	122	561	95	71	469	347
1939	169	657	76	67	403	298
1940	159	1321	68	69	628	464
1941	159	1436	72	101	614	454
1942	158	1398	n. a.	168	1449	n. a.
1943	207	561	n. a.	270	553	n. a.
1944	192	846	n. a.	362	735	n. a.
1945 1—8	n. a.	1960	91	n. a.	1944	2659

3. 国民政府统治地区:1936—1941年的资料引自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各年版。1942—1945年的资料引自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土货出口统计表》及《洋货进口统计表》的1942年12月号、1943年12月号、1944年12月号和1945年8月号。^①货币单位为法币。由于原资料中进口以海关金单位表示,按照“政府汇率”,即1942年1—3月1金单位=2.7元、同年4月以后1金单位=20元的比率进行了换算。

(二) 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推算

如表1所示,名义贸易额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呈增加趋势。但这主要是由于战时通货膨胀所引起的表面现象,因此,不能仅靠观察名义贸易额的变化,来衡量战时中国贸易的实际情况。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通过推算进出口价格指数来确定其实际数额。

^① 参见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第1—1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所载进出口价格指数,是在作者以往研究(以下称“旧推算”)①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推算。接下来,笔者将以新旧推算的变更之处为中心进行解释。② 旧推算中1942—1944年的价格指数,利用了汪精卫政权的贸易统计,推算局限于日军占领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追加了重庆政府的贸易统计数据(即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编《土货出口统计表》及《洋货进口统计表》),详见表2。

表2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推算

出口		1933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对上年度变化的倍率 (费希尔式值)	汪精卫政权			1.91	0.92	1.57	n. a.	
	重庆国民政府			3.18	2.73	2.26	n. a.	
出口价格指数 (1933年=100)	汪精卫政权			1048	966	1521	n. a.	
	重庆国民政府			1743	4755	10730	n. a.	
	综合	100	548	1098	1067	2382	n. a.	
名义出口额(100万元)	汪精卫政权	611	2901	1500	1210	1371	2799	
	重庆国民政府			192	164	997	448	
	总计			1692	1374	2368	3248	
实际出口额 (100万元)		汪精卫政权	611	529	143	125	90	n. a.
		重庆国民政府			11	3	9	n. a.
		总计			154	129	99	n. a.
	权重	汪精卫政权	1.00	1.00	0.93	0.97	0.91	n. a.
		重庆国民政府			0.07	0.03	0.09	n. a.
进口		1933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对上年度变化的倍率 (费希尔式值)	汪精卫政权			1.28	4.22	2.02	n. a.	
	重庆国民政府			22.55	2.63	2.43	n. a.	
进口价格指数 (1933年=100)	汪精卫政权			233	986	1989	n. a.	
	重庆国民政府			4105	10802	26205	n. a.	
	综合	100	182	667	3223	6521	n. a.	
名义进口额 (100万元)	汪精卫政权			651	1047	1456	3418	
	重庆国民政府			1445	3384	4418	14383	
	总计	1345	2400	2096	4431	5874	17800	
实际进口额 (100万元)		汪精卫政权			279	106	73	n. a.
		重庆国民政府			35	31	17	n. a.
		总计	1345	1319	314	137	90	n. a.
	权重	汪精卫政权	1.00	1.00	0.89	0.77	0.81	n. a.
		重庆国民政府			0.11	0.23	0.19	n. a.

① 参见木越義則「輸出入額・輸出入価格指數の推移(1864—1948)」,久保享編『中国经济史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木越義則『近代中国と広域市場圏——海關統計によるマクロ的アプローチ——』。

② 整个推算过程请参阅木越義則『近代中国と広域市場圏——海關統計によるマクロ的アプローチ——』第9章“貿易物價指數の推算”及卷末附表1。

出口价格指数:根据重庆政府的贸易统计,利用费希尔理想公式求出出口价格对上年度变化的倍率。然后,为将其与日军占领地区的出口价格指数综合起来,把汪精卫政权和重庆政府 1933 年价格表示的实际出口额作为权重,对日军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出口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

进口价格指数:1942 年 4 月,重庆政府将进口统计的货币单位“海关金单位”与法币的换算率,由 1 金单位 = 2.7 元变更为 20 元。根据《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份进出口货物总值国别表》^①,1942 年的进口额为 102 万金单位,折合法币金额为 1445 万元。也就是说,1942 年金单位与法币的平均换算率为 14.17 元。另一方面,重庆政府的贸易统计中使用金单位计数的费希尔价格指数的对上年度变化倍率,从 1941 年到 1942 年为 4.298 倍,因此换算成法币后,1941 年到 1942 年价格指数的变化倍率是 $4.298 \times (14.17 \div 2.7) = 22.56$ 倍。与汪精卫政权指数加以综合的方法,与出口相同。

(三) 出口价格的修正

旧推算的出口价格指数中未包括下列 3 项费用和税金,新推算中将其计入,并相应对价格指数进行向上修正。修正率如表 3 所示。

表 3 出口价格的修正率

单位:%

年度	内陆转运费	出口正税	出口附加税	救济附加税	总计
1867—1931	1.40	—	—	—	1.40
1932	1.40	3.49	0.20	0.20	5.29
1933	1.40	3.80	0.20	0.20	5.60
1934	1.40	4.61	0.20	0.20	6.41
1935	1.40	3.60	0.20	0.20	5.40
1936	1.40	3.46	0.20	0.20	5.26
1937	1.40	3.47	0.20	0.20	5.27
1938	1.40	2.16	0.20	0.20	3.96
1939	1.40	1.69	0.20	0.20	3.49
1940	1.40	1.39	0.20	0.20	3.19
1941	1.40	1.39	0.20	0.20	3.19
1942	1.40	1.39	0.20	0.20	3.19
1943	1.40	1.39	0.20	0.20	3.19
1944	1.40	1.39	0.20	0.20	3.19
1945	1.40	1.39	0.20	0.20	3.19
1946	—	1.61	0.20	0.20	2.01
1947	—	—	0.20	—	0.20
1948	—	—	0.20	—	0.20

内陆转运费:从长江及西江的口岸转运至云南、贵州和广西出口的货物,1945 年前的国内转运费未包括在出口额之内。据 Hsiao Liang-Lin 指出,该费用约占出口额的 1.4%。^②

^① 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份进出口货物总值国别表》,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第 1 册,第 11 页。

^② Hsiao Liang-Lin 认为该费用占云南、贵州、广西出口额的 6% (内陆转运费 4.5% + 其他经费 1.5%)。按其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计算,约在 1.4% 左右。该费用自 1946 年贸易统计起开始包括在出口额之内。参见 Hsiao Liang-Lin, *China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66—267.

出口正税:《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中,1932—1946年的出口额中未包括出口正税。出口正税占出口额的比重如表3所示,但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出口正税额,目前无法得知其正确数值,因此1941—1945年期间,采用1940年的1.39%作为修正率。^①

附加税:附加税包括出口附加税和救济附加税两种。^②出口附加税占出口额的比重,推定为平均0.2%。救济附加税也几乎与出口附加税同额,因此定为0.2%。

(四)进出口贸易额指数

按当年价格表示的贸易额,对旧推算进行了同上述(三)的修正。按1933年价格表示的贸易额,利用价格指数对按当年价格表示的贸易额进行了平减剔除。价格指数、贸易价额及该指数的推算结果如表5所示。

三、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

(一)贸易规模

根据表4所示数据,我们可以对有关战时中国对外贸易实力的基本事实加以推证。表4第9列和第10列所显示的是,以1933年为基准年度,中国的实际进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现将观察结果做如下整理:

第一,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进口和出口均几乎维持在日中开战前的水平。在进口方面,1937、1938两年虽出现较大的倒退,但1939、1940年则达到超出战争之前的较高水平。在出口方面,虽然规模缩小将近一成,但到1941年为止,基本维持在了与战前同等水平。

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缩小,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1942年进口和出口均锐减至1/4左右,直到战争末期为止,始终未见恢复。

那么,如果将中国分为日军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两个地区来观察对外贸易的变化,是否也能得到上述同样的结果呢?表5反映了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实际规模的变化。出口方面,可以看到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出口有很大增长。在进口方面也同样,在1939—1941年间,比日中战争前甚至增加了2—4倍以上。将表5所示数值用金额基数来表示,可得到表6。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全体中所占比重,大约在10%左右。

(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对外贸易

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对外贸易扩大和缩小的变化,基本上可以通过分析其商品结构,确定其变化要因。表7显示了该地区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在日中战争期间,主导出口的是矿产品、油脂蜡、动物产品,仅此数种即约占全体的70%。矿产品包括锑、钨、锡、水银等,主要用于同盟国的兵器生产。油脂蜡以桐油为主,主要用于汽车和飞机的涂料。动物产品以猪鬃为主,主要是牙刷的原材料,尤其其作为军备品拥有很大需求而闻名。这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特产,与欧美的机械工业、军需产业密切相关。欧洲大战爆发后,此类出口进一步扩大。

^① 出口税原则上被规定为从价5%,但以工业产品为中心,逐渐适用于减免措施(参见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関税通貨政策と経済発展——」、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127頁),1946年9月廢止。

^② 出口附加税自1932年,救济附加税自1931年12月起开始征收,至1946年4月止(参见Hsiao Liang-Lin, *China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 p. 134)。出口附加税虽被定为2.5%,但根据原资料计算,由于部分产品适用于减免措施,与出口正税同样实际税率较低。

表 4 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进出口总额(1933—1948 年)
Table 4 Price index and value of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3—1948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度 Year	价格指数(1933年=100) Price index(1933=100)		当年价格表示贸易额(1000元)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at current prices(thousand yuan)		同左指数(1933年=100) Index(1933=100)		1933年价格表示贸易额(1000元)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at 1933 constant prices(thousand yuan)		同左指数 (1933年=100) Index(1933=100)	
	进口价格指数 Import price index	出口价格指数 Export price index	进口额 Imports	出口额 Exports	进口 Imports	出口 Exports	进口额 Imports	出口额 Exports	进口 Imports	出口 Exports
1933	100.0	100.0	1345567	642374	100.0	100.0	1345567	642374	100.0	100.0
1934	85.5	92.7	1029665	569246	76.5	88.6	1204464	614048	89.5	95.6
1935	82.6	93.1	919211	605345	68.3	94.2	1112617	649968	82.7	101.2
1936	77.6	107.5	941545	742594	70.0	115.6	1213293	691017	90.2	107.6
1937	87.3	127.3	953386	880010	70.9	137.0	1092047	691339	81.2	107.6
1938	98.5	128.1	886200	787100	65.9	122.5	900087	614415	66.9	95.6
1939	96.4	183.5	1333654	1052817	99.1	163.9	1384116	573710	102.9	89.3
1940	140.6	331.8	2027143	2012453	150.7	313.3	1441764	606498	107.1	94.4
1941	181.9	535.5	2400361	2963995	178.4	461.4	1319261	553481	98.0	86.2
1942	667.5	1072.6	2096350	1745248	155.8	271.7	314064	162715	23.3	25.3
1943	3222.5	1043.2	4430963	1417810	329.3	220.7	137499	135909	10.2	21.2
1944	6521.2	2327.6	5874300	2443547	436.6	380.4	90080	104980	6.7	16.3
1945	n. a.	n. a.	17800377	3351283	1322.9	521.7	n. a.	n. a.	n. a.	n. a.
1946	411457	311895	1501165000	419408103	111564	65290	364841	134471	27.1	20.9
1947	3390870	1992188	10681327000	6390061554	793816	994757	315003	320756	23.4	49.9
1948	1300712463	773919502	3478803000000	4203761742000	258538074	654410319	267454	543178	19.9	84.6

Note: Manchuria is not included from 1933 to 1945.

表5 战时中国的实际贸易指数(1933年=100)

年度	出口			进口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1936	108	107	107	90	91	75
1937	108	105	133	81	81	77
1938	96	90	148	67	67	63
1939	89	80	178	103	98	184
1940	94	92	114	107	104	167
1941	86	82	130	98	83	342
1942	25	25	25	23	22	58
1943	21	22	9	10	8	51
1944	16	16	21	7	6	28
1945 1—8	n. a.			n. a.		

表6 战时中国的实际贸易额

年度	1933年价格表示贸易额(100万元)						比率(%)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日军占领地	国民党统治地
1936	691	639	48	1213	1166	46	100	93	7	100	96	4
1937	691	625	60	1092	1043	47	100	90	9	100	96	4
1938	614	539	66	900	860	39	100	88	11	100	96	4
1939	574	478	80	1384	1261	112	100	83	14	100	91	8
1940	606	550	51	1442	1332	102	100	91	8	100	92	7
1941	553	487	58	1319	1061	208	100	88	11	100	80	16
1942	163	151	11	314	279	35	100	93	7	100	89	11
1943	136	132	4	137	106	31	100	97	3	100	77	23
1944	105	96	9	90	73	17	100	91	9	100	81	19
1945 1—8	n. a.			n. a.			100			100		

表7 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单位:%

		1936	1938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出口	矿产品	51	47	31	59	45	0	5
	动物产品	8	14	18	6	2	22	46
	油脂蜡	7	14	18	14	4	2	5
	其他	34	25	33	21	49	76	44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进口	纺织品	5	9	33	60	35	28	20
	粮食品	20	15	15	4	22	3	4
	其他	75	76	52	36	43	69	76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如表 7 所示,自 1939 年起进口比重开始增加,主要是纺织品尤其是棉布的进口量迅速增加。纺织品约 40% 经由香港进口,其大部分是在上海制造。另外,由英属印度进口的约占 20%,由日本进口的也约占 10%,具有相当规模。1937 年前,西南诸省通过长江航运从上海移入纺织品等消费类产品,而在中日两军最前线的长江中游流域的航运遭禁之后,上海→香港迂回路径被频繁利用。也就是说,该时期进口的迅猛增加,实际上应理解为移入。

另一方面,1942 年开始的进出口锐减现象,无疑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贸易路线被日军阻断,该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和消费品移入困难所至。在出口方面,从量价格相对较低的油脂蜡等商品的搬运量开始减少,接着从 1943 年起矿产品的出口也几乎绝迹。进口方面也从 1942 年起,经由香港的纺织品移入开始锐减。

(三) 日军占领地区的对外贸易

华北地区是日据中心地区,因此通过考察该地区对外出口的变化,可以对日本经济控制的程度进行分析。如表 8 所示,即使从整个中国来看,华北地区的贸易量也一直保持了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是由于以煤炭为主的矿产品和食盐在不断向日本和“满洲国”出口。

表 8 华北地区出口商品结构

单位:%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出口品 (%)	燃料(煤炭)	5	6	6	14	18	29	33	28	35
	纤维原料(羊毛·棉花)	25	25	43	5	4	3	30	26	18
	动物制品	20	19	15	28	29	15	4	2	4
	榨油用种子	10	9	7	9	8	10	8	10	5
	其他	40	41	29	44	41	43	25	34	38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出口指数(1933 = 100)		117	111	130	72	65	48	26	39	15

但是,日中战争前,在华北出口商品结构之中,其主要出口商品并非矿产品,而是以羊毛、棉花为代表的纤维原料,各种动物制品及榨油用种子等农畜产品。而其最大的市场则是美国。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占领,导致了华北的对外贸易关系发生了剧变,由面向美国市场的农畜产品,转变为面向日本的矿工业品。由此可见,战时华北的重工业化,是建立在牺牲农畜产业的基础上被推动的,对此需加留意。

结 语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综合考证重庆国民政府和汪精卫政权的贸易统计,对战时中国对外贸易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笔者在推算出一系列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后,求得实际数额,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日中战争期间的对外贸易基本维持在与战前相等或超出战前的规模上,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迅速缩小至战前 1/4 以下的水平。第二,日中战争期间的“繁荣”,是源于日军未能完全控制占领地区的贸易行政以及中国与欧美市场间得以维持的运输线。第三,即便综合重庆国民政府的贸易统计数据,对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趋势的评价,也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日军占领

地区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贸易规模的比重,战时也基本维持了与战前相同的9:1的比例。

最后,关于战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推算,今后还须进一步细化。第一,1945年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推算,在本文执笔时还未能完成,笔者将继续进行推算。第二,在撰写本文之际,重庆国民政府的临时战时消费税资料得以公开。预计通过该资料,不仅在对外贸易方面,在国内贸易方面也能获得较以前更为详尽的统计数据。第三,与东北地区(“满洲国”)之间的关联,本文未加考量,将作为今后的课题加以研究。

[作者木越义则,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译者王大川,日本立命馆大学言语教育中心外国语嘱托讲师]

(责任编辑:马晓娟)

《中国人留学史》(上、下册)面世

章开沅、余子侠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114万字,398元

章开沅、余子侠教授主编的《中国人留学史》一书,虽在确定书名时借鉴了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提法,但在研究时空范围上远远超出了后者,将1847年1月4日容闳一行启程赴美留学作为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的起点,详细阐述了由此至今的中国人留学史;在空间上不仅涵盖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等传统留学国家,也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中国人留学青睐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章开沅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余子侠先生既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同时也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由两位担纲主编的《中国人留学史》,非常自然融汇了历史学与教育学的知识,真正做到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可以说,书中既有古今“游学”与“留学”的思辨,亦有近代中国留学政策、留学制度的介绍与分析,还有历史编年式地对近代中国人留学实践的阐述与总结。全书共分八章,一是被称为“起航维艰”的甲午战前之留学行动;二是1895年至1911年晚清留学“热潮乍起”时期,三是1912年至1927年民国前期留学的“潮起潮落”,四是1927年至1949年民国后期留学的“一波三折”,五是1949年至1972年新中国初期留学的“东风送航”,六是1972年至2000年改革开放时期留学的“热潮再涌”,七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留学行动的新篇章,八是港澳台地区的留学变迁史。港澳台地区的留学史,是其他中国人留学史研究相关论著中较少注意,或相对容易忽视的内容,而本书则注意并努力弥补这一缺憾。本书编者谦逊地说:“从一定的层面或角度上讲,本题研究的内容是一部中国人为着留学如何‘出国’的历史,而不是一部中国人出国后如何‘留学’的历史。”虽然书中努力介绍近代中国人的在外留学生活,但由于资料和时代所限,这确实是一项需要继续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概而言之,本书既是对以往中国人留学生史研究的总结,又指出了未来中国人留学史研究的新方向,值得学界同仁关注。(徐志民)